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参考资料选辑

第二輯下冊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

1957年12月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参考资料选辑

第二輯下冊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

1957年12月

目 录

郭沫若：駁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1957年7月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發言）	609
郭沫若：我們堅持文物事業的正确方向（1957年9月16日 在文物界反右派分子座谈会上的發言紀录）	618
郭沫若：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必須进一步深入（1957年9月18日 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講話）	622
范文瀾：走火和放火	631
楊显东：党是引导我們向科学进军的最英明的指揮者 (1957年7月1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發言)	635
胡 繩：絕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1957年7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發言）	640
胡 繩：爭取無产阶级世界观的徹底胜利（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發言）	648
于光远：發展我国科学事業的兩条道路	662
于光远：我們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	672
李 达：批判費孝通的买办社会学	679
严中平：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搬到中国以后	698
翦伯贊：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708
陶希晋：法律界的斗争	716
韓幽桐：粉碎法学界右派分子的复辟企圖	724
吳德峰：法学界反右派斗争必須进一步深入开展（在中国科学院 召开的座谈会上的發言）	729
徐 平：为什么只要法律不要政策？	733
王 水：駁“無法可依”和“有法不依”	736
魯 影：誰說工农审判員不懂法律？	742
專門拆社会主义大厦的“工程技术專家”——雷天覺	744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 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746
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	
馮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	754
周揚同志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第二十七次 扩大会議上的講話（摘要）（1957年9月16、17日）	761
錢俊瑞：保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文艺事業（1957年9月13日 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議上的發言）	768
錢俊瑞：大大加強黨對文艺事業的領導（1957年9月17日在中共中国 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議上的書面發言）	775
邵荃麟：文艺上兩條路線的大斗争	785
邵荃麟：斗争必須更深入！（1957年9月17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 党组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扩大会議上的总结發言）	797
郭沫若：努力把自己改造成為無產階級的文化工人 （1957年9月17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議上的講話）	811
茅 盾：明辨大是大非，繼續思想改造（1957年9月17日在中共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議上的講話）	818
周建人：論作家的品質	823
曹 銌：灵魂的蛀虫	827
冬 今：一举成名了不得	831
何其芳：馮雪峰的反党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想 （1957年8月16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議上的發言）	834
歐陽予倩：讓吳祖光在太陽照耀下現出原形（1957年8月9日在 中国剧协、中国影联批判吳祖光右派言行座談会上的發言）	848
康 濡：能够“放心”和“容忍”么？	847
一个青年作者的墮落（批判刘紹棠右派言行大会的報導）	850
茅 盾：我們要把刘紹棠当作一面镜子（1957年10月11日 在批判刘紹棠大会上的講話）	858
严文井：刘紹棠反对的究竟是什么？（1957年10月7日在批判 刘紹棠大会上的講話）	862

周信芳、袁善芬：戏曲演员要在反右派斗争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
(1957年7月11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联合发言)………873

* * *

“解放日报”社论：深入开展办报路线问题的辩论	879
沙 英：列宁的办报原则“过时”了吗？	884
安 岚：驳“新闻自由”的谬论	889
安 岚：驳“封锁新闻”之说	896
甘惜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	900
李 章：我们和新闻界的右派分子争论什么？	906

陈克寒：出版工作必须实行计划化	913
倪子明、王城、王仿子：什么是我国出版事业的传统	918
梁纯夫：曾彦修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	923
林 今：右派分子为什么提倡办“同人出版社”	927

* * *

赛福鼎：“用衣襟遮掩不了太阳”(任何抹煞人民的巨大成绩 的打算都是愚蠢的)(1957年7月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931
帕提汉·苏吉尔巴也夫：社会主义是新疆各族人民唯一正确的 道路(1957年7月12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938
奎 璧：从内蒙古的情况看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1957年7月13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942
阿沛·阿旺晋美：西藏一年来的成就(1957年7月11日在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948
孙殿才：党的民族政策又一辉煌胜利(1957年7月13日在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952

* * *

钱俊瑞：从右派反苏罪行说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956
于光远：认真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纪念十月革命 四十周年)	963
姚溱、王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胜利(庆祝伟大的	

* * *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并举	991
“统计工作通訊”资料室：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情况	998
李 峰：七年比一百年（“算帳”备忘录）	1019
田 林：补七年比一百年（“算帳”备忘录之二）	1023
二十七年来上海市工人生活水平的变化	1028

—— 分 ——

“教学与研究”社論：認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1087
鄒魯風：吳景超等右派分子的兩個反动方案注解（1957年7月 30日在批判右派分子吳景超大会上的發言）	1095
章罗联盟对高等学校党的领导的猖狂进攻	1110
若 素：揭露李景汉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陰謀及其社会調查 的反动实质（1957年8月8日在批判右派分子李景汉大会上的發言）	1117
王 南：批判葛佩琦、王德周	1125
王 南：駁斥許孟雄关于我国外交政策的反动言論（1957年7月 29日在批判右派分子許孟雄大会上的發言）	1151
孙映通：林希翎贩卖的是什么？	1155
許征帆：林希翎論戰手法的批判（1957年5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學 “自由論壇”上的發言）	1166
苏 星：批判賀安的反社会主义言論（1957年6月22日在“賀安的關於 三害产生的根源及根除三害的措施”辯論会上的發言）	1176
吳大琨：賀安想掩飾自己的反动政治立場的手法是騙不了人的 (1957年6月28日在“賀安思想批判大会”上的發言)	1183
王方名：賀安“建議”的思想实质及其論証方法（1957年6月28日 在“賀安思想批判大会”上的發言）	1188
一貫仇恨党和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李德	1197
俞聖祺：中國人民大學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 初步分析	1202

駁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

(1957年7月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發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長
中國科學院院長 郭沫若

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面地总结了我們國家在过去一年來的偉大成就和丰富經驗，严正地駁斥了右派分子的种种荒謬言論，并在其中解答了科学界普遍关心的有关科学工作的問題。我完全拥护周总理这个报告和其他各項報告。

現在請允許我就有关科学工作的問題作一点补充的說明。

廣大科學家積極進取，願為偉大建設事業服務， 並且對科學工作提出積極的批評和建議

我国的科学事業，解放以來逐步呈現出了繁榮的景象。广大科学家的精神是积极进取的，願意貢獻自己的力量为国家的偉大建設事業服务。去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后，科学家們更表現了参加社会主义建設的空前的積極性。有不少的人参加了發展科学的远景规划的制訂，并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同时，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国家其他部門以及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对于科学工作都給予了进一步的重視和支持，这就使得我国科学事業，在很短的时期內，获得了显著的發展。

在科学事業大踏步前进的途中，自然会出现許多問題和困难，需要人們去解决。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會議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使科学家們获得了正确解决这些問題的犀利的思想武器。在學習毛主席的報告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和其他科学机关在四月間，接連召開了一系列的、有許多科学家参加的座談会；五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学部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議；六月中旬，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議。在这些會議上，科学家們就如何进一步發展我国科学事業的問題，进行了热烈的討論，同时对科学工作也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議。这無疑对于克服缺点和改进工作是有極大好处的。

当然，不能設想，所有的批评意見都一律正确。事实上，在我們科學家中还存在着一些程度不同的錯誤的看法和想法。例如，我們認為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科学工作应当有計劃有領導地进行，进行科学研究应当根据国家建設的需要与个人專長和志趣相結合的方針，并应当以服从国家需要为原則。但有些科学家却認為科学工作可以不需要計劃和领导，科学研究可以不和国家的各項建設工作相结合，他們主張在科学研究上的絕對的个人自由，要为科学而科学。此类錯誤意見之所以产生，是有它的主观和客观的根源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工作的原則，对一部分科学家來說，还很不習慣。一部分科学家对我国科学工作的实际情况也还不很了解，对于在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还不知道应当怎样采取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因此，一些錯誤思想的产生，是不足为奇的。如大家所知，党和政府正在和科学家一道，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来逐步解决最近一个时期出現的有关科学工作的一些思想問題和实际問題，以便把工作推向前进。

右派分子企圖夺取科学工作的領導权，所謂关于 科学体制的意見書就是这种惡毒企圖的供狀

然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乘机利用一部分科学家的錯誤思想，向党和政府大肆进攻，企圖夺取科学工作的领导权，并且引导科学家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章伯鈞等人的主使下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名义提出和發表了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問題的几点意見”，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种惡毒企圖的一个供狀。

右派分子所謂“保护科学家”的口号不外是
离間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

这个意見書中提出了所謂“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显然是企圖造成一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事实上有人說过这样的话：“解放以来，中国知識分子遭了浩劫。”他們这样不顧事实危言聳听的目的，不外是想离間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引誘他們走上錯誤的道路。

多数科学家，从亲身的經歷中，已經發表了公正的意見。他們深深地感到，党和政府，是尊重、爱护和信任科学家的；党和政府也不断地在努力为科学家准备尽可能良好的工作条件。他們認為解放以来几年間在党和政府領導下的中国科学事業的發展抵賽过以往年代的几十年、几百年。事实也正是这样。

以科学事業的經費为例，中国科学院的經費开支，以一九五零年为一百。一九五三年即达到一千零三十五。一九五六年更达到二千零六十二。絕對数值为六千六百七十四万元。而在抗日戰爭以前的一九三六年，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每年經費合起来不超过四百万元。高等学校的經費开支中專門用于科学的研究的部分近年来也有很大增長，仅仅高等教育部分分配給各高等学校的科学 研究經費，如以一九五五年为一百。一九五六年即为八百一十一。一九五七年更达到一千三百五十一。絕對数值为一千万元。

再以进口外国科学書刊的情况为例。一九五六年仅購買資本主义国家書刊所支出的外匯即为一百八十万英鎊，一九五七年略有縮減，但仍达到一百五十万英鎊。这个数字，比日本、印度、苏联进口的数字都大。以一个研究所为例：前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有圖書兩千余冊，杂志三十四种；而現在新建的化学研究所即已經擁有圖書一万四千八百余冊，杂志八百二十五种。

在这些数字面前，凡是正直的科学家，誰能够不承認党和政府在保障科學家的工作条件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呢？

自然，我們國家的建設事業十分繁重，人手既少，基礎不強，財力又並不充裕，在保障科學家工作條件方面，我們一時還不能做到事事令人滿意的地步。我們還有許多缺點、錯誤和努力不够的地方，今后應當努力克服和改進。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把這一方面的工作是當做經常的重要任務來處理的，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在這方面已經進行了大量的工作。這些情況，右派分子並不是不知道，但他們有意抹煞事實，裝出一付悲天憫人的樣子，大聲疾呼“保護科學家”，他們的用心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的嗎？

民盟中央科學規劃臨時小組的意見書是一個徹頭徹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工作綱領。

右派分子反對黨和政府的科學工作方針，企圖從
根本上改變我國科學工作的社會主義性質

在科學工作的組織和領導問題上，意見書中提出了同黨和政府的方針正相對立的主張。黨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學研究工作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意見書中對於這一點一字不提。黨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學研究要有計劃的進行，要“重點發展，相應照顧”，意見書則主張不要計劃，不要重點，分散地、自發地進行。黨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學研究要有統一的學術領導，要有帶領整個科學工作前進的“火車頭”，意見書則主張不要統一的學術領導，不要“火車頭”。

科學研究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是我國科學工作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基本特徵，也是我國科學工作區別於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工作的基本特徵。一切愛國的科學家是懂得這一點的，是願意這樣做的。右派分子却企圖引導科學家離開國家建設的需要，其目的便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科學工作的社會主義性質。

為了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我們必須從我國科學工作的現有基礎出發，有計劃有重點地適當集中、密切協作，迅速加以發展，使之徹底改變向來同國家建設需要不相適應的狀況，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应有的作用。但是，意見書中却主張一切“研究工作”和“經

費”都應該“就人”而安排，即是反對重點發展，反對必要的集中，反對發展新的部門和機構，主張那些服從國家需要改換了工作崗位的科學家回到“原來的研究環境”，即是反對科學家走上國家需要的新的重要崗位。他們之所以反對黨和政府的這些措施，主張分散進行、自由發展，實質上就是不希望科學工作改變它不能適應國家需要的老路，不希望科學工作作為國家的建設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

意見書中特別反對對科學工作的統一的學術領導，反對科學工作中的“火車頭”。大家知道，能把全國的科學力量組織成為一個統一的隊伍，發揮巨大的力量，這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在發展科學事業上的優越性的具體表現，是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任何國家所不能做到的。我國科學工作几年來的實踐證明，要統率和指揮這樣一個統一的科學隊伍，就必須有一個統一的領導，有一個“火車頭”。周恩來總理去年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正確地指出了這一點，最近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也重新肯定了這一點。右派分子認為這樣規定的“火車頭”是“主觀的先行規定”。他們主張科學事業的各自為政，實際上就是要把科學工作陷於無政府狀態。

反對科學工作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反對有計劃有重點地發展科學工作，反對對科學工作的統一領導，其結果就是要把我國不能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來發展科學事業，就是要使我國科學工作長期停留在落後的狀態。我相信，我國絕大多數科學家是絕對不能同意右派分子的這些倒行逆施的主張的。

右派分子“一視同仁”的口號是對青年的挑撥和欺騙

在培養新生的科學力量的問題上，右派分子提出了一個所謂“人民內部在培養機會上應一視同仁”的號召，並且指責說：“過去在升學、升級、選拔研究生、留學生時，有片面強調政治條件的偏向”。他們企圖以資產階級虛偽的“平等”觀，在青年中進行挑撥和煽動，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對黨和政府不滿。

不錯，在高等學校招考新生的規定中，對於五種考生是要給予

在成績與一般考生相等時優先錄取的待遇的。這五種人是：（1）少數民族學生；（2）華僑學生和港澳學生；（3）工人、農民，工農速成中學本年畢業生，工農干部；（4）復員建設軍人和轉業軍人；（5）革命烈士的子女。

這樣的待遇能夠說是不平等嗎？不能夠。如果要“一視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說工農學生吧。大家知道舊中國在反動統治之下，工農子女被剝奪了受教育，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現在，反動統治已經推翻了，對於這個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狀況，難道我們不應該盡最大力量來加以改變嗎？應當指出，在這一方面，我們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消除舊社會留下的不平等現象。為了說明這一點我要舉出這樣幾個百分比。

高等學校一九五六年九月在校學生中，工農成分只占34.29%，同一期間在校的研究生中，工農成分只占17.46%。中國科學院現在在學的研究生中，工農成分只占5.92%。據1952—1956年留蘇預備班資料，留蘇學生中工農成分只占30.1%。這些數字，告訴了我們：現在受國家培養的青年科學干部，工農成分只占少數，而資產階級、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則仍然占多數。在這種情況下，右派分子還提出所謂“一視同仁”的口號，他的欺騙和挑撥性質不是十分明顯的嗎？

對於少數民族學生，他們同樣是在反動統治下被剝奪了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的，對於回國求學的華僑和港澳學生，對於為革命犧牲了的烈士的子女，要給以必要的照顧，這是千應該、萬應該的事，我這裡不準備多說。

右派分子還有一種挑撥性的說法，據說在培養青年科學干部上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享有“特權”。這也是所謂“一視同仁”的口號的一個思想背景。這事實上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露骨的表現。他們娓娓一點說，便是“片面強調政治條件”。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是不能讓步的。在選拔青年科學干部上，政治標準必須堅持，這是一點也不能動搖的。國家所需要的是社會主義的建設人才。共產黨

員、共青團員如果符合选拔的标准，包括政治的和業務的标准，就应当多多选拔。共产党员多，共青團員多，这在我們看來正是好事，而在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看來却是坏事。右派分子之所以極尽其排斥共产党员、共青團員之能事，是他們的階級本質所決定的。排斥工农、排斥共产党员、共青團員，其目的就在于改变我国科学技术后备队伍的階級成分和政治質量。右派分子是在企圖偷天換日。

自然，对于非工农出身的，非党非团的青年，党和政府同样是十分爱护和尽力培养的，決沒有也不会对他們采取歧視和排斥的态度。以中国科学院現在在学的研究生为例，其中地主、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即占41.4%，非党非团的即占37.9%。思想是可以改造的。一切非工农出身的和非党非团的学生，只要自己願意，都能把自己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事業的專家，同工农子弟和党团员一样为国家貢献自己的力量。

右派分子企圖用“恢復”資產階級社会科学 的办法來反对馬克思主義

在社会科学方面，意見書提出了“首先改变对待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态度”和“恢復”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意見。这是什麼意思呢？这实际上就是說，我們首先要去發展資產階級的社会科学，而不是發展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这个意見是能够接受的嗎？

社会科学有鮮明的階級性。資產階級的所謂社会科学，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是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务的。資產階級虽然很早以来就建立了“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等形形色色的所謂社会科学，但是資產階級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从他們狹隘的階級利益出發，不可能真正科学地闡明社会历史發展的規律，解决种种复杂的社会現象。因此，从根本上說来，所謂資產階級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人类历史和社会現象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是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里才开始。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社会科学上的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反資產階級学者唯

心主义的、形而上學的觀點，把社會經濟形态的發展看作自然歷史過程，從一切社會關係中劃出生產關係來，并把它當作決定其餘一切關係的基本關係。這才為真正的社會科學奠定了基礎。

解放以來，我國社會科學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隊伍，比解放以前擴大得多了。這是在革命勝利以後，經歷了幾次偉大的社會改革運動，特別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和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運動，在我們的社會科學家中，有許多人逐漸拋棄了原來的資產階級思想觀點，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而同時大批年青的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又從各方面成長了起來，因而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獲得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方向。當然，我國當前社會科學的發展，還是遠遠不能滿足國家建設的需要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還存在着嚴重的弱點。最根本的弱點是，我們的社會科學隊伍中，能夠真正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學問的人還是太少。在對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的鬥爭中，我們表現出不够有力。因此，在我看來，今后為了發展社會科學，首先的任務就在於繼續擴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的隊伍，提高馬克思主義的水平，而不是什麼發展資產階級社會科學。那種“恢復”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主張，實際上是開倒車，反對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社會科學。如果按照這個主張去做，其結果是削弱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而使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重新泛濫。當然，這是違反大多數的社會科學家的願望的，也是違反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的。

意見書中還有這麼一種論調，說“有人”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里的社會科學要從頭創造，沒有可繼承的”。這是毫無根據的謠言。馬克思主义者一向主張繼承一切有益的文化遺產，這在毛澤東主席的許多重要著作和中國共产黨的許多重要文件中，都有非常明確的指示。事實上大多數的社會科學家都是十分尊重文化遺產的。只有那些被稱為“穴居野人”的虛無主義者才主張拒絕一切文化遺產。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歷史上一切知識的總結。只要讀過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底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列寧選集”中文版第一卷69—

74頁)這一著名論文的人，誰都會十分清楚地知道這一點。所謂“從頭創造”的說法，不過是右派分子的一枝暗箭罷了。

當然，在文化遺產問題上，我們和某些人之間，是存在着原則上的分歧的。有一些人把資產階級的文化遺產奉為神聖，主張全盤接受，或者簡單地予以“恢復”，我們則採取批判的態度，謹慎地吸收其中積極的、有益的成分。要批判地接受文化遺產，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必須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我們就會失去批判的能力，就無法接受有益的東西。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明白地指出：右派分子是和我們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場的。

章伯鈞等右派分子的陰謀真象大白，科學家們要對右派分子進行堅決的鬥爭，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民盟中央科學規劃臨時小組的“幾點意見”，實際上就是一個在科學工作方面的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綱領。這不是一個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鈞等右派分子企圖奪取國家領導權，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領導權的陰謀的一部分。章伯鈞等右派分子為了奪取文教工作的領導權，在民盟成立的四個臨時工作組中，首先加緊“科學規劃組”和“高等學校黨委制組”的活動。光明日報在發表“幾點意見”的同時，還發表了短評，認為這是“為互相監督開拓了新路”。真是好一個向資本主義復辟的所謂“新路”！看來，這個“幾點意見”實際上就是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所“設計”出來的第一批貨色了。

現在這個陰謀已經揭穿，真象已經大白，右派分子指望在科學家中爭取大量群眾的幻想已經完全破滅了。事實證明，右派分子必然是標準的主觀主義者。他們對於自己作了過高的估計，對於群眾作了過低的估計。這就使得他們的一切不得不宣告完全破產。

中國科學家絕大部分是愛國的，是願意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所利用、所驅使的人畢竟只是少數。就是這少數叫嚷“保護科學家”的人，我們認為他們倒應該有必要自行保

护。他們應該赶快清醒起来，徹底清算自己的思想，分清敵我、明辨是非，同絕大多數的科學家們站在一道，堅決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我在这里想代表中國科學家們說一句話，也可以說等於宣誓，我相信科學家們是會同意的。我們中國科學家要長遠地堅持自願自覺的思想改造，在對右派分子進行堅決鬥爭中，進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沿着社會主義的道路，繼續前进。

（選自1957年7月6日“人民日報”）

我們堅持文物事業的正確方向

（1957年9月10日在文物界反右派分子座談会上的發言紀錄）

郭沫若

中國很早就有重視古文物的風氣，研究古文物也有長遠的歷史；大致從漢朝起，人們就對出土的文物引起重視，有時封建皇帝獲得一件古銅器，就改一次年號。在封建統治的時代，人們重視古文物，都把它當寶物，私藏壟斷起來，作為古董供個人欣賞，成為一種古董趣味。這是一種壞風氣。但也有好的一方面發展，那就是有人注意了對古文物的整理、研究。如許慎《說文解字序》：“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古代大文學家許慎很能利用古器物上的銘文作文字變遷的研究。西晉時在汲縣魏襄王的墓里發現了大批竹簡，當時即遭散失，但古代的學者們從剩余的竹簡中，整理出來好幾種戰國典籍，其中就有著名的“竹書紀年”。到了北宋時代，研究金石器物，已成為系統的學問，有一段光輝的成就，如呂大臨的“考古圖”和“宣和博古圖”，把古青銅器仔細地繪圖、測量、考釋銘文，有時聯繫到歷史、地理。北宋以後，這門學問沒有得到發展。直到清代，研究金石之學復盛，并有新的成就，如吳大澂、孫詒讓、王國維，對這方面的研究有很好

的成績。但是在旧社会里，这种研究，总是受到时代的限制。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随着帝国主义在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我国的文物也遭到他們蛮橫的搶劫。英、美、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都搶走了我国大量的珍貴文物。一方面由帝国主义分子直接动手来盜取，例如敦煌的壁画，有的已被他們剝走；大同云崗、洛陽龍門等处的許多佛像，遭到断头折臂的破坏、盜运；西安著名的石刻唐代昭陵六駿，被美帝偷运去二匹，还有四匹也已被打破成几段，准备偷运，被当地人民攔住，未及运走。

还有我們國內的一些唯利是圖的民族敗类，他們勾結帝国主义分子，把大批文物卖給外国。如殷周青銅器，善本古書等等，其中有不少都卖給美國。美國的文化特务竟恬不知耻地說：“以后要研究中國學問的人，恐怕非到美國來不可了”。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分子和民族敗类的內外夾攻之下，祖国地上地下的珍貴文物，遭到了大規模的破坏，卖到外国的古文物，不可計量，真是空前未有的浩劫。

历史上許多封建王朝也曾严重地破坏文物，封建統治者有时把出土的古物，視為不祥之物，大加毀損；如北周时曾將大批銅像器物毀廢；有的王朝也因为排斥佛教的关系，破坏了許多寺院和佛像、碑幢。現在各地常有大批殘破不全的佛像出土，就是證明。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人民从長期被奴役的境遇中解放出来，人民把国家的事，看成自己的事，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生产力得到了解放，这是一种比原子弹还强大的力量。解放几年来，國家各種建設事業突飞猛进，例如長江大桥，原定1958年才能完工，今年就可通车了，并且还节约了經費三百万元。党在各方面的建設成績，擺在我們面前，大家有目共見。文物事業在党的領導下，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首先，党和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法令，防止了珍貴文物人为的流失和破坏；其次，隨着国家基本建設的發展，地下丰富的博物館、文物倉庫陸續被打开，出土文物，为